

中国的原手斧及其传统

安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010)

关键词 原手斧;砍砸器

内 容 提 要

中国的原手斧包括双面器、单面器和三棱器三类,分布于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几十处地点,以华中的发现最为丰富。它们属于旧石器初期的遗存,旧石器中期以后已大体绝迹。

中国的原手斧与砍砸器、石球等共存,不同于阿舍利文化传统的手斧。中国旧石器初期至少有两个文化传统,即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砾石工业和以周口店文化为代表的石片工业,但华北的原手斧传统后来已被石片工业所完全代替。

一、引 言

手斧 (Hand axe) 是旧石器时代初期具有特色的一种工具,主要分布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西部、南部一带,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发现较少,在性质上又有若干差异,从四十年代起便提出旧石器时代初期世界上存在着“手斧文化”(Hand axe culture) 和“砍砸器文化”(Chopper-chopping-tool culture) 两个传统的见解 (Movius, 1944, 1948)。尽管上述划分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两个传统有无联系,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如认为东亚的旧石器与西方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Bordes, 1978); 或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处在隔绝的状态而缺乏外来的文化影响 (Aigner, 1978); 或者认为纵有手斧的存在,“它是按照自身的传统与方式向前发展的”(戴尔俭, 1985)。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如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的手斧来自西方的传播(安斋正人, 1983), 或认为旧石器初期已存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黄慰文, 1987)。总之,关于手斧的分布及其是否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还是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中国是否有手斧的存在,也产生过不同的见解,至少从石器的命名上便可以看出分歧的所在。从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开始发现以来(贾兰坡, 1956), 陆续有所报道, 并出现综合论述,把中国的发现纳入与手斧文化交流的范畴(黄慰文, 1987)。由于缺乏规范化的界定,有关手斧的分类和名称,迄未取得一致的认识,除直接归入手斧之外,尚有似手斧尖状器、尖状砍砸器、大尖状器和三棱尖状器等名称,甚至有些标本还被纳入砍砸器的系统。严格地讲,这种以砾石和石片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完全不同于以石核工业为代表的典型手斧——阿舍利手斧。因此,我们采用原手斧 (Proto-handaxe) 一词予以概括,并不意味着它是手斧的前身,只是表明属于不同的传统;同时还可用来代表这一特殊工业的

砾石石器的组合或群体。至于某些偶然性的或时代较晚的类似品,则应排除于本传统之外。

原手斧在中国的发现,最近已日趋丰富,不过在报道中大抵以典型标本为代表,往往难于了解它的组合或群体,甚至许多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在分析上难免受到一定的局限。作者于1987年和1989年两度去湖南澧水流域调查,对十几处地点和出土石器作了观察和记录¹⁾。此外,还对陕西汉中和广西百色两地的部分标本作过观察。在上述资料的接触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对原手斧的石器群特征也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今结合有关的报道试图加以分析。

本文拟就中国原手斧的类型、分布、年代和文化性质进行分析,并对有关的遗存试作对比和讨论。

二、类型和分布

分布在欧洲、非洲和亚洲西部、南部的阿舍利文化手斧,以石核石器为主,多由两面加工成椭圆形或梨形的两面器,周边或绝大部分有曲折的刃口,制作规整细致,具有比较共同的特征。中国的原手斧则呈现另一套风格,基本上属于砾石石器的范畴,主要采用砾石或厚石片,除两面加工以外,不少是单面加工的,刃口呈陡坡状,往往超过70度,多修成锐利或圆钝的尖端,甚至把器身修成三棱状,除刃口外绝大部分保留较多的砾石面。器形较大,一般在15厘米左右,制作简单粗糙,形态不甚规整,有的可能出自端刃砍砸器或劈裂器(Cleaver)的变异。主要形制包括下列三种:

I. 两面器 由两面交互加工,较多的具有锐利或圆钝的尖端,据刃口的修整方式,又可分为两类: A. 周边修整成刃口,计见于山西襄汾丁村(裴文中等,1958)、河南三门峡市(黄慰文,1964)、湖南澧县红旗、津市虎爪山(图1,1)、广西百色(曾祥旺,1983); B. 局部或大部刃口经过修整,保留部分砾石面以利于用手把握,保留最多的达1/3或1/2以上。计见于陕西蓝田平梁(戴尔俭,1966)、涝池河(盖培等,1976)、乾县(邱中郎,1984)、汉中梁山(阎嘉祺,1981;汤英俊等,1987)、湖南澧县栗木(图1,2)、红阳、乌鸦山、津市虎爪山、石门大圣庙、烟支堆、青狮塘、广西百色(曾祥旺,1983;何乃汉等,1987)、新州(广西文物队,1983)。前一类较少,而以后一类居多。

II. 单面器 刃口由单面加工,多保留局部或大部的砾石面以利于把握,基本形制与IB一致。计见于陕西蓝田公王岭(盖培等,1976)、湖南澧县栗木(图1,3)、彭山、津市虎爪山、石门烟支堆、常德五里岗、慈利金台、安徽宣州向阳(房迎三,1988)、广西百色(曾祥旺,1983;李炎贤等,1975,何乃汉等1987)、新州(广西文物工作队,1983)等。

III. 三棱器 器身或尖端的横剖面呈三棱状,多为单面加工所制成,尖端锐利,可分为两类: A. 尖端和器身俱作三棱状,以山西襄汾丁村最为典型,曾被称为大三棱尖状器(裴文中等,1958),同类的还见于山西芮城匿河(贾兰坡等,1962)、陕西汉中梁山(阎嘉

1) 承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地市县文物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谢意。本文引及的湖南标本都根据当时的观察记录,其中以澧县栗木的发现最为丰富,其中原手斧一项即达二十余件。其它各地点的发现,总数也在三十件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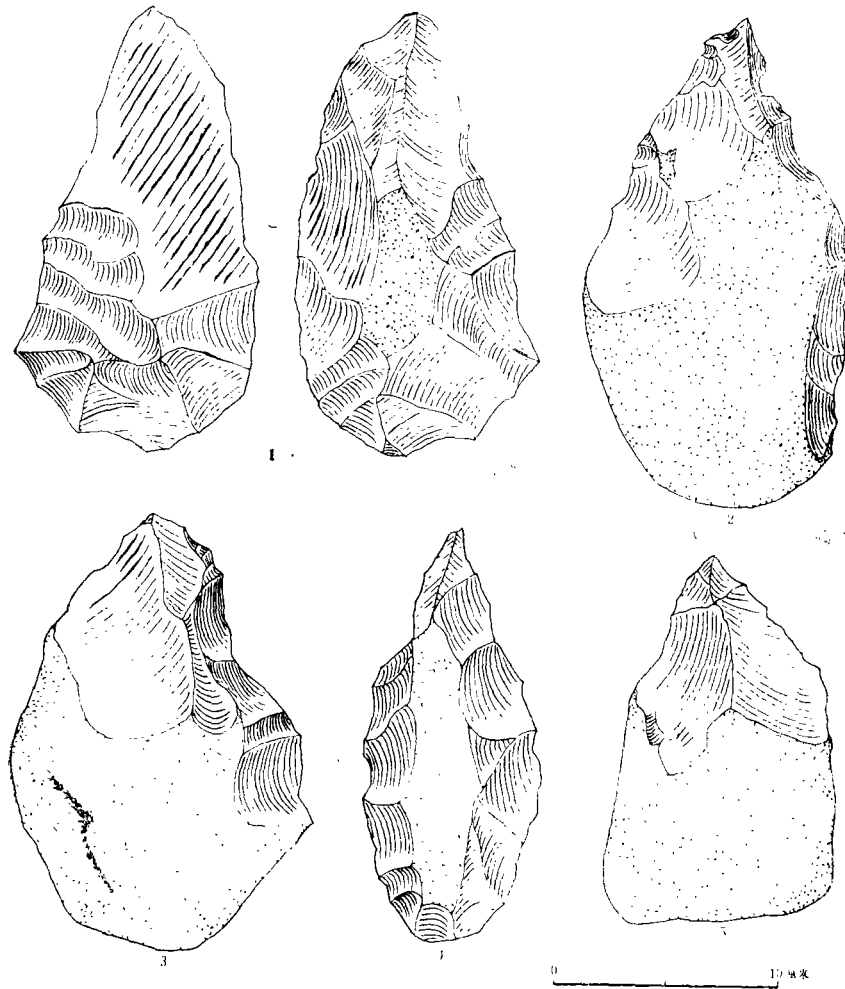


图 1 湖南出土的原手斧

Proto-handaxe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1. 津市虎爪山 Huzhaoshan, Jinshi county (Type IA) 2. 澧县栗木 Limu, Li county (Type IB)
 3. 澧县栗木 Limu, Li county (Type II) 4. 澧县红旗 Hongqi, Li county (Type IIIA)
 5. 津市虎爪山 Huzhaoshan, Jinshi county (Type III B)

祺, 1980)、湖南澧县栗木、红旗(图 1, 4)、乌鸦山、津市虎爪山; B. 沿两边单面打击, 形成隆脊的三棱尖端, 器身的大部保留砾石面。计见于湖南澧县栗木、玉圃、津市虎爪山(图 1, 5)、慈利金台、安徽宣州向阳(房迎三, 1988)、广西百色(曾祥旺, 1983)。

根据以上的分类, 制作工艺虽稍有差别, 但基本形制一致, 以 IB、II、III B 尤为明显, 往往具有锐利或圆钝的尖端, 器身一般保留较多的砾石面, 应属于原手斧传统的共同特征。至于丁村沙女沟的标本(裴文中等, 1958), 是唯一类似手斧的孤例, 但出自地表面采集, 并不能作为中国存在手斧传统的证据。

中国原手斧的地理分布, 可划分为下列三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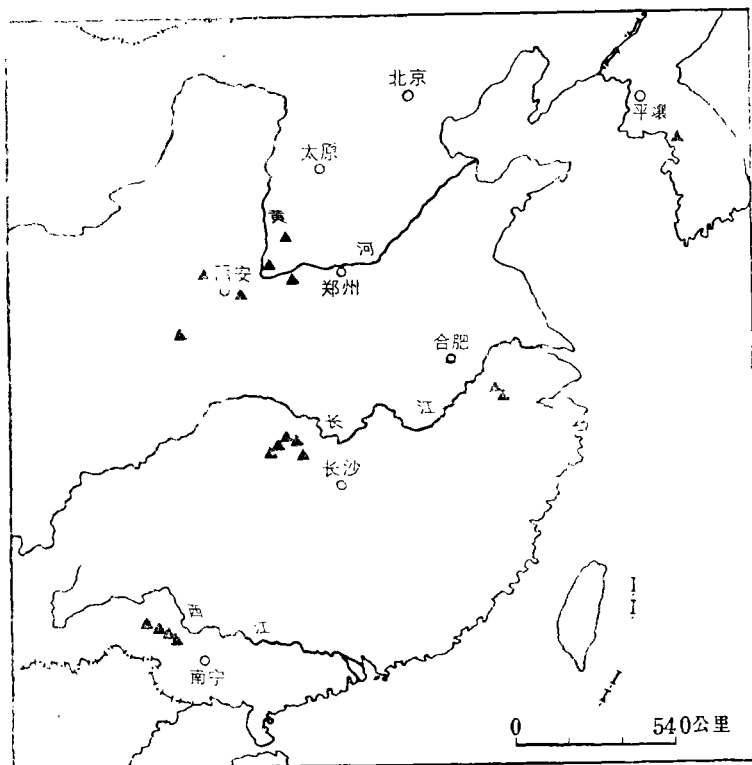


图2 原手斧在中国及朝鲜的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proto-handaxes in China and Korea

1. 华北 以渭河、汾河汇流黄河的三角地带为中心，包括陕西乾县、蓝田、山西襄汾、芮城和河南三门峡一带。虽然报道的数量不多，但器形比较典型，同华中、华南相当接近，同时还比较普遍地有石球伴存，至于周口店和水洞沟等遗址的所谓手斧(贾兰坡，1956)，应是偶尔出现的类似品，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普遍存在。至少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原手斧在华北的分布还不十分普遍。此外，辽宁海城小孤山的所谓手斧(张镇洪等，1985)系晚更新世的偶然性孤例，暂可排除在外。

2. 华中 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目前的发现比较丰富，像陕南的汉水上游、湖南的澧水流域和安徽的水阳江流域都有分布，出土地点各在十数处以上。这一带涉及的地理广泛，分布相当集中，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当属于原手斧的中心地区，不过石球的数量较少。

3. 华南 以广西的右江流域为中心，发现的地点达十数处，文化面貌也与华中相接近，也缺乏石球共存。

从全国范围来讲，以上各地点的发现还比较零星，不过分布的大体轮廓已基本清楚，即原手斧传统可能是以华中和华南为中心，而华北则处在边缘地带与其它的文化传统(如以石片石器为代表的周口店文化)并存，对于探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系统方面，当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三、时代和文化性质

中国的原手斧大抵出土于中更新世的地层堆积中,代表旧石器初期的文化遗存,有些标本虽出自地表采集,但据形态和共存石器的组合,可以判断与产自地层的标本基本属于同一时期。不过对某些遗存的年代认识也不尽一致,今按地理分布来分别讨论其层位依据和不同见解如下:

1. 华北

陕西蓝田平梁出自比蓝田人化石层位稍低的红色土中,据认为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戴尔俭,1966),涝池河也出自红色土(盖培等,1976),至于公王岭南坡(同前)和乾县(邱中郎,1984)虽系地表采集,其地层和时代当与前述的标本一致。山西芮城陶河出自中更新世的砾石层(贾兰坡等,1962)。以上的地层里多有哺乳动物化石共生,可作为断代的依据,其中蓝田人的古地磁年代约为100万年(程国良等,1978)也可作为有力的佐证。

丁村的标本出土于汾河沿岸的砂砾层中,据贾兰坡的发掘简报(1955)判断为中更新世晚期与红色土相当。而正式报告又改订为晚更新世早期相当于黄土和黄土底砾石层(裴文中等,1958),但据动物化石的轴系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210 000—160 000年(陈铁梅等,1984)。这里属于河湖相堆积,不同遗物的年代难免有早晚混淆的可能,不过石器的形制繁多,制作规整,表现出相当进步的形态,但某些动物化石并不排斥处在中更新世末叶的可能性。轴系法的年代测定或可作为补证。丁村以后已罕见原手斧的存在,当可作为年代下限的标志。

2. 华中

陕南汉水上游出土于第三阶地含有大块钙质结核和零星的动物化石的淡红褐色砂质亚粘土中,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汤英俊等,1987)。

湖南澧水流域的原手斧主要出自第二、三阶地(个别的为第四阶地)的网纹红土中,安徽水阳江流域的原手斧也出自第二阶地的网纹红土。由于不见动物化石,缺乏断代的依据,一般应定在中更新世(房迎三,1988)。

3. 华南

广西右江流域主要出自第三阶地的网纹红土中,在断代上除了笼统地定为旧石器(曾祥旺,1983;何乃汉等,1987)外,尚有晚更新世(李炎贤等,1975)和中更新世(黄慰文,等,1988)等说法,当以后者为是。

从地层的断代依据来看,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石器群,主要出土于华北的红色土和华南的网纹红土中,两者的时代应大体相当,均属于中更新世。秦岭以南湿热化作用的产物网纹红土(Teilhard et al., 1935; 刘东生等, 1964),虽缺乏动物化石的断代证据,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也可以辅助说明两者的时代相当,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遗

存。

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石器群,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即以砾石或厚石片为主要原料,包括交互或单面打击的加工方式,一般不够规整,往往呈现陡坡状的刃口或具有锐利的尖端。器形硕大,多在 15 厘米左右,最大的可达 28 厘米。共生的石器以砍砸器为最多,也有少量的石球(石球的数量以华北较多,但华中稀少,华南则完全不见,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罕见小型的石片,也缺少使用或加工的痕迹,表明它们是以砍砸器为主体的大型石器群,至于原手斧是从砍砸器里发展出来的一种具有砍砸、刮削、挖掘的万能工具,可作为旧石器初期文化的代表器形。华中、华南的旧石器中期和晚期遗址尽管保留了砾石石器的工艺传统,但原手斧已罕有发现。至于全新世晚的遗址,如山西怀仁鹅毛口(贾兰坡等,1973)、襄汾大崮堆山(王向前等,1987)和广西东兴贝丘遗址(广东省博物馆,1961)也发现某些类似的器形,不过前二者属于打石场中所制造的粗坯,而后者则属于某种专门用途的工具(如“螻蛄啄”),虽在形制上有相似之处,但与原手斧的传统无关,不能混为一谈。

四、讨 论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以原手斧为特征的石器群,在中国境内有广泛的分布,文化特征也相当明确,它是大型的砾石或厚石片为原料,可分为两面器、单面器和三棱器三种类型,往往具有锐利的尖端,可能代表一种具有砍砸、刮削和挖掘的万能工具。它在数量上少于砍砸器,或与石球共存,小型的石片石器数量有限,应代表一个特殊的工业传统。从整个性质上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不同,因此称其为原手斧以资区别。

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石器群,在东南亚一带有广泛的分布(Movius, 1944、1948),从器形和工业上同中国的标本比较接近,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范畴也还难以肯定,事实上问题并不十分简单,暂时还不可能用某种模式来统一对待,正像莫维士本人也承认几十年前的提法不足以概括东亚和东南亚的复杂情况(Movius, 1978),当然把手斧和原手斧视为同一个传统(安斋正人,1983)或认为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证据(黄慰文,1987),我们很难表示赞同。

东亚的情况也基本相似,中国以外,南朝鲜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的发现(金元龙等,1983)同样属于原手斧石器群,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相当密切。至于日本大分县早水台(贺川光夫,1987)和蒙古(Okladnikov, 1978)发现的所谓手斧,前者属于个别的标本而形制较小,后者没有发表图片,还难以判断它们的性质。至少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它们同典型手斧之间似有较大的差异,还难以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个传统。

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石器群在中国的发现,对于研究旧石器文化系统方面也具有相当的意义。过去曾对华北的旧石器文化提出两个系统的概念:即“匭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贾兰坡等,1972)即前者以大石片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而后者的则以不规则的小石片所制造的石器为特征。根据今天的资料,似应作进一步的修正,即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属于两个系统,以原手斧为代表的大型砾石石器传统,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一带,华北仅限于局部地区,与以周口店文化为代表的石片石器传统并存。丁村文化已不再使用砾石为原料,原手斧的残存即将宣告结束,而更晚的

许家窑文化,虽有不少的石球残存,但已属于石片石器的传统,或许表明在华北一带到了晚更新世原手斧已趋于绝迹。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周口店文化,虽有大型的砍砸器和少量石球共存,但不见原手斧的存在(裴文中等,1985),第十五地点出土的个别标本则属于偶然性的类似,尚不能作为原手斧存在的证据。同时石片石器在发展上有逐渐小形化的趋势,作为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主流。至于砾石石器传统却属于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的主要遗存。除原手斧多见于中更新世外,直到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砾石石器的传统还存在继续被使用。

如上所述,中国的原手斧,普遍出现于中更新世,个别的或可延续得稍晚,不过到晚更新世已基本绝迹,因此原手斧可作为旧石器初期文化的一种标准石器。至于全新世所出现的许多类似的器形,属于制作石器的粗坯或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工具,它们同原手斧之间毫无联系,不能作为同一传统来对待。

(1990年2月28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 广东省博物馆,1961。广东省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2): 644—649。
- 广西文物队,1983。广西新州打制石器地点的调查。考古,(10): 865—868。
- 王向前、李占扬、陶富海,1987。山西襄汾大岗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6: 87—95。
- 刘东生、刘敏厚、吴子荣、陈承惠,1964。关于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第四纪地质问题,45—46。科学出版社,北京。
- 汤英俊、宗冠福、雷遇鲁,1987。汉水上游旧石器的新发现。人类学学报,6: 55—60。
- 邱中郎,1984。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3: 212—214。
- 何乃汉、邱中郎,1987。百色旧石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6: 289—297。
- 李炎贤、尤玉柱,1975。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 225—228。
- 房迎三,1988。皖南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调查简报。文物研究,3: 74—83。
- 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1984。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3: 259—269。
- 贾兰坡,1955。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简报。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91—104。科学出版社,北京。
- 贾兰坡,1956。在中国发现的手斧。科学通报,(12): 39—41。
-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1962。涇河——山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1—35。科学出版社,北京。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1972。山西寺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 39—58。
- 贾兰坡、尤玉柱,1973。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2): 13—26。
- 张镇洪、傅仁义、陈宝峰、刘景玉、祝明也、吴洪宽、黄慰文,1985。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4: 70—79。
- 黄慰文,1964。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8: 162—177。
- 黄慰文,1987。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6: 61—68。
- 黄慰文、刘源、李超荣、员晓枫、张镇洪、曾祥旺、谢光茂,1988。百色石器的时代问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95—101。文物出版社,北京。
- 曾祥旺,1983。广西百色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史前研究,(2): 81—88。
- 盖培、尤玉柱,1976。陕西蓝田地区旧石器的若干特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4: 198—203。
- 阎嘉祺,1980。陕西汉中地区梁山龙岗首次发现旧石器。考古与文物,(4): 1—5。
- 阎嘉祺,1981。陕西汉中地区梁山龙岗首次发现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 1—5。
- 程国良、林金录、李素玲,1978。蓝田人地层年代的探讨。古人类论文集,151—157。科学出版社,北京。
- 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周明镇、刘宪亭、王择义,1958。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97—109。科学出版社,北京。
- 裴文中、张森水,1985。中国猿人石器研究。228—235。科学出版社,北京。
- 戴尔俭,1966。陕西蓝田公王岭及其附近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0: 30—32。
- 戴尔俭,1985。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传统。人类学学报,4: 215—222。
- 安斋正人,1983。アシユール系ハンドアックス石器群のアジアに於ける展开。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研究紀

要, 3: 1—43。

- 贺川光夫, 1987. 东アジアの前期旧石器文化——贾兰坡教授三稜大尖状器(尖头砾状器)の展开。东アジアの考古と历史, 上: 1—23, 图 5。
- 金元龙、裴基同、郑永和、黄龙浑、崔茂藏、朴东源、李相万、张楠基、李鲜馥、高柳昌弘、J. D. Clark, 1983. 全谷里—遗蹟发掘调查报告书, 1—612。文化财管理局文化财研究所出版, 汉城(朝鲜文)。
- Aigner, J. S., 1978.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North China. In: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 223—224. Ed. Fumiko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Paris.
- Bordes, F., 1978. Foreword. In: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 IX—X. Ed. Fumiko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Paris.
- Movius, H. L., 1944.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3): 103—104.
- Movius, H. L., 1948. The lower pala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 s. Vol. 38, part 4, P. 407—411.
- Movius, H. L., 1978.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Conclusion. In: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 351—355. Ed. Fumiko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Paris.
- Okladnikov, A. P., 1978. The palaeolithic of Mongolia. In: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 317—325. Ed. Fumiko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Paris.
- Teilhard de Chardin, C. C. Young, W. C. Pei, H. C. Chang, 1935. On th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Kwangsi and Kwang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14(2): 179—205.

THE PROTO-HANDAXE AND ITS TRADITION IN CHINA

An Zhimin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eijing 100010)

Key words Proto-handaxe; Chopper-chopping tool

Summary

Many proto-handaxes have been found in China. Alth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nomination differs among scholars, they are important for research on the systems of the Palaeolithic in China.

These proto-handaxes are made of pebbles and thick flakes. They are large in size and usually irregular in shap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various types: bifaces, unifaces and artifacts with a triangular cross-section. A few dozen loca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the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 Northern China, including parts of Shaanxi, Shanxi and Henan; 2. Central China, including southern Shaanxi, Hunan and Anhui, all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valley; 3. Southern China, only in part of Guangxi. The localities in Central China are more dense in distribution and more plentiful in number.

These proto-handaxes were chiefly found in stratigraphical layers of the middle Pleistocene and mostly belong to the early Palaeolithic, some of them may be later, but after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Age they were almos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deposits of the Holocene there are artifacts which look something like proto-handaxes, but they are Neolithic implements and have no direct relation to the proto-handaxes.

The proto-handaxes discovered in China are fewer than the chopper-chopping tools found there.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bolas and other artifacts and together with them constitute assemblages of large stone implements. Their shapes and chipping methods and the artifacts associated with them are all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typical handaxe of the Acheulian tradition. We call them proto-handaxes to indicate that they are of another tradition in the world. The handaxes discovered in Korea and Southeastern Asia belong to the proto-handaxe too,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ose in China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cultural systems in the early Palaeolithic of China. One is the pebble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proto-handaxes and the other is the flake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the Zhoukoudian culture. By the late Palaeolithic Age, proto-handaxes were replaced by the flake industry in North China.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however, the pebble industry had been continued until early Neolithic after proto-handaxes disappeared. It is the main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late Palaeolithic in China.